



堪察加的民族分布地图



1993年，科夫兰
的阿尔卡拉拉莱
节。(卡斯滕拍摄)



2003年，帕兰纳附近，
科里亚克族和埃文族退
休驯鹿牧民和人类学家
埃里希·卡斯滕交流知
识。(A. Urkachan拍摄)



2003年，莱斯纳
亚附近的科里亚
克族海豹猎人。
(卡斯滕拍摄)

社会政治环境变迁中身份 认同的转变：堪察加的伊 捷尔明族(Itel'mens)、科里 亚克族(Koryaks)和埃文族 (Evens)^①

埃里希·卡斯滕

埃里希·卡斯滕博士(Dr. Erich Kasten)于1984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人类学(民俗学)博士学位。他曾在加拿大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1993年开始，又在堪察加半岛作田野调查。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期间，他在许多博物馆举办了展览，并且积极投身于多媒体制作。最近，他主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关于俄罗斯北部本土民族知识的项目。他的主要兴趣之一，是记录堪察加人濒临失传的文化遗产，并通过当地的社会使之得以保存和发扬。更多的相关信息见其网站：<http://www.siberian-studies.org>

德国研究联合会(DFG)及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为我在加拿大西北部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田野调查提供资助，谨此致谢。

引言

本文将“身份认同”视作选择社会关系所需的识别地图，它应用于生活中的每一天，并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作用，人们借此得以应对或者适应其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毫无疑问，“身份认同”的上述属性既不是约定俗成的，也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们会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和每个人的不同经历，被持续地重塑、重构和重建，终其一生。在本文中，我会关注北部的居民毕生身份认同发展变化的情况及其外在条件和动因。我将阐明，他们的身份认同(或者他们某些特殊的方面)在哪些场合会受到重视，在哪些时候又会被忽视。我还会指出，在哪种范围中，可以把他们的身份认同看作源于自我建构，或者相反，在哪些范围中，身份认同是外在体制化的结果。我会特别关注后两种身份认同之间高度活跃的互动，因为“真实的”身份和“宣示的”身份不应该理解为彼此隔绝的对立面。

社会关系及其象征性的表达

1. 现今仍见诸宗教仪式的身份认同

在科里亚克族和埃文族驯鹿牧民的世界观中，超自然的存在或者神灵总是住在鹿群迁徙范围内的某个特定的地方，他们掌管着动物的安康。因此，在进入一片新的领地时，牧民最好在第一个休息之处，把伏特加和烟草投入火中，向这块土地的神灵献祭。今天在堪察加，当你和埃文人同行的时

候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活动。而在年纪较大的科里亚克族驯鹿牧民中，类似的宗教仪式更是历历可见。比如，当驯鹿走失或者丢了的时候，牧民就会趴在冻原上一种特殊的石头上面听声音。又如，难以作出抉择的时候，比如不知道该往哪里驱赶驯鹿群才是正确的方向，那么这时他们就会拿出一块有如神物的驯鹿左肩胛骨，琢磨上面的图案。当地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他们的神灵寻求指点和忠告。在一些神圣的位置，还可以看到一种扩展身份认同的象征性表现形式，那种扩展的身份认同超越了土地上的人群，而将土地上的超自然神灵包括在内。关于人和超自然神灵间不稳定关系的相似看法，见于其他许多西伯利亚人的狩猎社会，例如汉特人(乔丹，2003，281)。

随着政治环境的某些变化，比如外来的所有权观念强加到当地人身上，那么当地人的特定身份认知必然会遇到挑战，并常陷入冲突。从这点考虑，关于传统的领地(即土地是否能为人所“独占”)，人们就会产生新的完全不同的归属观，认为领地与其固有的超自然力量脱离。在其他事情上，这种变化也会造成很大的困惑(尤其对于堪察加很多地方的老一辈人来说)，最近关于一项提议所引发的争论可作例证：这项提议要在当地民族中建立新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比如 *obshchiny*。

在每年年底举办的特殊的盛宴上，科里亚克人都要与本土的超自然主宰，及领地内被捕获的动物作宗教仪式性的对话。这既强化了他们共同的身份认同，也加深了自身与超自

然主宰之间的联系。在沿海的莱斯纳亚科里亚克人的奥—鲁—鲁(*O-lo-lo*)盛宴上，他们载歌载舞，通宵达旦，面前摆放着前一个捕猎季节宰杀的海豹和高山绵羊的尸体。他们藉此表达对动物的敬畏，并且希望动物能把它们在人类这里受到的体面的待遇报告给遥远宇宙中的神灵。临近盛宴的尾声，将有小片木头或神圣草地(*lauten*)双叶草，标示每具被宰杀的动物尸体。这些东西或与高山绵羊的躯干一同悬于神圣的树上，或与海豹饥渴灵魂的双叶草一起放在盛了水的碗里。天亮之前，这些都会被焚烧，以送往另一个遥远的世界，而一旦向神灵牲祭(*tolkusha*)完毕，社区的成员也会瓜分这些作为祭品的肉。盛宴还包括其他一些宗教仪式的表演，例如用仪式所需的螺旋桨(*telytl*)模仿动物的声音。人们在歌舞中模仿动物的特定动作和声音，以此与它们作宗教仪式性的对话。社区的成员通过这种方式寻求他们和当地动物的传统联系，表达个人和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联系使人和动物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关系，并标示了明确的地方性共同身份(卡斯滕，2005)。楚科奇人也有类似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表明，当地民族群体中存在更大范围的身份认同，即包括当地的祖先和各种超自然力量的身份认同(瓦特，2005)。

在堪察加西海岸沿线遥远的南部，今天的伊捷尔明人也有类似的宗教仪式，但方式殊异，类似节庆。科夫兰(Kovran)村的伊捷尔明人会举行年度的盛大节日，叫阿尔卡拉拉莱(*Alkhalalalai*)。节庆的目的在于加强其民族的身份认同，而非旨在强调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传统上同

属某一特殊地方，也不是为了强调他们与当地超自然神灵的关系。与上述盛宴不同的是，伊捷尔明人的“阿尔卡拉拉莱节”很有特点，即融合了传统文化中现存或改造过了的元素和新近创造及借鉴来的外来文化元素。节庆的意义，偏重于宣示伊捷尔明人自己的民族身份，以便于及利于节庆的组织者达到其实际的政治目的。250多年前，G.W.斯特勒就描写过这种接近舞台表演的宗教仪式，如今这些宗教仪式更收纳了不同文化的元素，及北太平洋沿岸其他民族的固有习俗，比如在祈祷仪式中，作法的萨满头戴羽饰，而身边的柱子还戴有头冠(参见图片1)。这种(异文化元素的)融合，将伊捷尔明人的民族身份认同连接到或者延展到“泛种族”的状态，由此可见，全球化中的伊捷尔明族本土政治领袖游说能力具有国际水准。同时，这种仪式还合并了其他元素，比如源于苏联时期政府的文化部门的颁奖和奖励，加入到传统的盛宴中。节庆的音乐，以伊捷尔明-俄罗斯人的抒情诗谱成，同时用手风琴和鼓伴奏。在节庆活动中，专业的舞蹈团会表演舞台性质的舞蹈，这些舞蹈以创造性的艺术方式，将不同民族的风格和当地的传统风格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的芭蕾艺术烩于一炉。所有的这些创新均显示出日益复杂的身份认同，事实上，出席和参与节庆的大多数当地人都融入其中。

阿尔卡拉拉莱节的例子也说明，这种“宣示”的身份认同很容易为他们的主要代理人或主管所操控。伊捷尔明人的传统盛宴一旦在整个堪察加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流传开来，多民族合作的情况和社区的身份认同事实上便会遭忽视或者

淡化。这是因为节庆的大多数参与者，甚至大多数参与演出的艺术家，虽然名义是属于“伊捷尔明族歌舞团*El’ vel*”，但他们并不全是伊捷尔明族人，也有科里亚克人和其他外来的民族。

关于这点，需要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莱斯纳亚人一直想方设法抗拒苏联和现在政府的地方文化部门以及其他政治活动家、资助者接管并利用组织其奥—鲁—鲁(*O-lo-lo*)盛宴的企图。在当地的民众看来，*O-lo-lo*盛宴必须仍然由单个的家庭来组织和管理，唯此，才能保证它将严格地保持原来的方式。因此不出意料，2002年12月，另一些沿海的科里亚克人在奥索拉举行类似的考—鲁—鲁(*Kho-lo-lo*)盛宴，就引发了紧张和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当地政府的文化组织是否介入盛宴的一个特殊程序，该程序从一开始就由当地的两位长者主持，地点在其中一位长者的家里。在他们严格地按照传统的程序进行完了宗教仪式之后，盛宴的后半部分就为当地“文化局”的代表所把持，这位代表提出插入娱乐活动，比如舞蹈比赛和苏联式的颁奖节目，据说是“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兴趣”。

比较上述的这些变化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些不同层面的身份认同，在象征性的表现形式中有多么大的差异。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变化有时也彼此连结，融合并形成新的、更复杂的身份认同。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新的身份认同极易就为外面的政府官员或本地的领导掌控，并被贴上了符合其利益需求(经常是政治利益)的特殊的

(经常是“民族”)标签。加拿大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少数民族也有与此相似的多层身份认同，但其表现过程会更具创造性和活力(卡斯滕，1995:365)。

2. 物质文化和艺术中的身份认同的表现

与本土艺术家、手艺人一起工作时，大多数的民族学者会不假思索地或下意识地，按照一定的风格分类(经常是民族的风格)归类其研究的对象，以便符合既成的先例或博物馆和收藏者常用的类别。在工作的初期，我自己当然也不能免受这种诱惑，遂经常堕入俗套，将调查的问题按标准化分类。标准化的问题导致了标准化的答案。比如，在一个案例中，一位科里亚克妇女正在缝制驯鹿皮的大衣(*kukhlianka*)，我的问题引出的回答就是：“我看不见我妈妈是这么缝的，所以我也这么缝”。之后，我跟她在伊切河畔她的木屋里一起工作了一个星期，又骑着马在埃索西边共同工作了三天，那时我才得以将她复杂的手艺和她独特的成长历史联系起来。她骄傲地告诉我，当她于1961年驱赶着牧群由北南下、几乎穿越了整个堪察加半岛时，她是多么热切地渴望与沿路的其他手艺人一起工作啊，她对和他们一起工作充满了好奇。她随时随地学习自己特别喜欢的缝纫技巧和独特设计，走到哪儿学到哪儿。最后她和一个埃文人结了婚，定居下来，在她住的地方周围邻居差不多都是埃文族的人。那么结果就是，她缝制的衣服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层面的风格和当地的某些

特色。同时，由于同时通晓科里亚克语和埃文语，所以她非常不情愿把自己划归于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当然，护照上，她不得不选择了其中一项民族身份。

舞蹈的风格，我在其他文章里也详述过(卡斯滕，2004:16)，当地的舞蹈表演者和艺术家认为他们的舞蹈和那些界定精确、“纯粹”的民族舞类型有很大的不同。而民族学者或者局外人偏偏常喜欢将之归于成类。例外也有，就是当艺术家们推销自己的时候，就会选用那些老套的题材作为营销的工具。但是，大多数手艺人或者艺术家在其职业生涯中，仍会经常遇到外国人，他们也十分欢迎外国人的到来。与外国人的交流，使他们能在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新的风格，而这些新的发展变化，则反映出他们渴望着展示和证明自己具有跨地区、多民族的经验，同样，也反映出他们自己日益扩展和复杂化的身份认同。就像其他地方的案例一样，堪察加的各族人在和外国人接触时显然也非常开放，这种开放性带给他们有用的材料和知识，然后又经他们转化成极重要和必要的创新。

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外界对堪察加人的分类基于何等偏见，这些偏见甚至由他们自己的民族学家强行灌输而成。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偏见经常不足以反映当地人真正感觉到的、真实的身份认同。显然，当地人一直迫切地希望，外来文化能够纳入到他们当地的传统(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当地的传统已经是多民族的了)中来。

3. 以语言的形式表达的身份认同

过去有些假设和观点，认为民族和语言是划等号的，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现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近代以来日益变化的语言，并未必然地影响到民族的身份认同。因此，一个人坚持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并不能成为确认其民族身份的根本要素。即使一种语言已经衰零，不足以应付日常交流，它(或其中某些部分)仍存活于其他的功能，就像伊捷尔明族语言的例子(卡斯滕，1998：5)。在该案例中，值得追问的是，社区的成员为什么如此迫切地想保留他们的语言，而且他们那么强烈地鼓励我们协助他们那样做。事实证明，少数还能说伊捷尔明族语的人最关心如何保留他们语言在当地的一些变体。这些情况表明了特定流域的民族的身份认同，而这些身份认同，从他们1960年代迁居到科夫兰村至今，依然存在。他们致力于保存本民族语言，1980年代曾得到苏联国家项目的有力关照，有教科书以标准的伊捷尔明族语出版，但很多当地人早已看不懂了。

早在18世纪，伊捷尔明族语的多种变体就给G.W.斯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74：211)。那时，即使彼此相邻，住在不同流域的人使用的伊捷尔明语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如今，伊捷尔明族的老一辈人还在强调他们和某个流域的密切关系，以此来坚持其身份认同。那个流域是他们成长的地方，是从前的家园，但现在已经废弃了。基于这种原因，他们非常渴望能够保存自己的一些方言变体，为此近些年还出版了相关的学习材料(Dürr、卡斯滕、Khaloimova，

2001)。仔细分析人们对他们使用语言的态度，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们对从属于某一个流域的地方性身份认同，往往和其作为现居地居民的身份认同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就像现在伊捷尔明人非常强烈地提出并宣称他们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一样。然而，上述的那种从前的地方性身份认同多见于伊捷尔明族的老年人，他们的语言仍然生动地连接他们与其传统领地的情感。而与此同时，年轻人则建立了自己不同的地方身份认同，那是他们离开河谷的家园以后形成的。这种身份认同连接着他们和他们成长的新地方，虽然与老年人的情形相反，却也不难理解。

生活在多民族环境中的一些少数民族，经常特别喜欢强调其原有语言中某些特征、甚至是只言片语的重要性，这种强调有时纯属“虚构”。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想与其他民族的语言区别开来。

显然，用语言来保持或者重建某种身份认同的这种方式，和上述通过物质文化和表演艺术来表现身份认同的方式并无二致。换言之，手艺人和艺术家们在传统风格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寻求新的、经常是综合性的风格，藉此展示他们现实的、新的、更复杂的身份认同。

地方身份认同和/或民族身份认同

堪察加当地的社群，诸如上文所提到的生活在河谷的伊捷尔明族，并非生活在隔绝的状态中，他们与邻近的民族通过互相交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其中最大的优势在于，与那

些同自己的经济形成互补的民族建立关系，以及与不同源的民族比邻而居。因此，即使在今天，当地的许多老人通晓多种语言仍是十分常见的现象。比如，季吉尔斯基区的南部就有一些会说科里亚克语、埃文语、俄罗斯语的老人，早些时候，他们中还有一些人会说伊捷尔明语。这种现象反映了跨民族交流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出超越民族的交往环境尤其有助于当地人形成特殊的身份认同。

有一点确凿无疑，即跨地区、跨民族的交往之所以会长期成为北极周围极为普遍的交往模式，是因为这种交往方式有利于人们适应严酷的自然环境(克虏伯尼克，1993；伯奇1980)。直至今天，这种跨民族的交往关系，在堪察加西部内陆的这一边仍由埃文族和科里亚克族(又称Chauwchu人)的驯鹿牧民维系，在堪察加西部沿海的那一边，则有伊捷尔明族和沿海的科里亚克族(也叫Nymylans人)的交往。他们的关系不仅密切，甚至可称之为共生互依。这种关系通常由每个家庭(经常要经过好几代人)经过长期的良好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当地人称之为priiatel制度)栽培。跨民族的交往关系最终还扩展到了堪察加的东部。在堪察加的中心区域，沿着堪察加河，堪察加的本地人和移居而来的俄罗斯人也建立了这种跨民族的交往关系。在如何长期维系这种关系的问题上，当地老人们的生活经历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苏联时期，尽管有新型的社会组织和工作单位(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介入，以及随着这些变化而产生的苏联的身份认同，但是跨民族交往的关系组

带依然保存了下来。这些老年人的生活经历反映了一个身份认同的各个层面，他们从自己看到问题的角度，就个人身份认同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真实观点。总体而言，身份认同向日益复杂化的趋势发展，具体来说，其某些方面被淡化或忽视，而另一些特征则因为适应特殊环境之需而得到重视。

上述材料表明，受访的当地老年人更愿意把民族的差异看作建立跨民族交往关系的有用财富，而非障碍。这也是我们在此讨论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所在。显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否认自己作为渔人或驯鹿牧民的原有身份，而是说，他们独特的职业技能不仅给他们个人乃至整个民族带来了自豪感和自我意识，而且，他们利用特殊资源的能力(或良好的基础)及其成效，已成为他们与其他民族发展贸易合作关系的宝贵资本。比较起来，他们在访谈中清晰声明其原有的民族身份，甚至都很少提及。

实际的身份认同和/或声称的身份认同

对不同年龄的人群和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经历作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他们如何建立和组织其身份认同的每个层面。这里所说的生活经历主要是指，在不同历史时期盛行的时代精神影响之下，当地的各种变化和人们对主流文化及公有化的各种适应方式。上文引证的例子说明了家庭身份认同的底层框架建立于人的幼年时期或青年时期。这种底层框架通过家庭内部不同辈分之间的知

识传递形成，比如，父亲或爷爷将狩猎领地内的环境情况和超自然知识传给儿子或孙子，母亲或祖母将制作服装的花纹图案传给女儿或孙女等。通过口头流传的方式、共同的价值以及语言(包括在当地的各种变体)，年轻人学习到祖先留下的图案，增加了知识，这样他们就有信心认定自己乃是当地某一民族的成员。

但如果一个人在他/她的后半生有了跨地区、跨民族的接触和经历，那么他/她年轻时形成的身分认同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有可能促使他/她把自己和原来同民族的其他成员区分开来。即使在同一个家庭里，我也可以探寻到这种身分认同观念上的分歧。下面就以阿纳夫盖伊(Anavgai)一个科里亚克族家庭中的三兄弟为例，看看他们在总体世界观和牧养驯鹿方式上的差别。他们三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和方式都不同，后来在驯鹿饲养业中又担任不同的职位，承担不同的责任。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中的一位强烈地认同传统的环境知识，而另一位则笃信苏联意识形态提出的技术进步和相关的方法，这些方法源于他从俄罗斯北部某驯鹿牧民大学所接受的共产党的培训。

有整整一代人(现在他们的年龄是50岁，或50岁以下)曾在寄宿学校接受教育，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传统的乡村生活，在传统的村庄废弃之后，也没有经历过重新安置点的生活。他们的身分认同已经和上文提到的那些主要生活在当地的人不同了。对他们来说，现在的身分认同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不断浮现于我们的访谈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们

和同学(*odnoklassniki*, 俄语, 意思是学校里班级里的伙伴)之间有着亲密又团结的感情。共同的经历催生了特别强烈的身份认同, 特别对于那些现在已届中年或接近中年的人。这种身份认同经常能贯穿人的一生, 而且在个人需要实际的帮助和支持时可以动用和依靠。那些后来在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工作过的人, 则建立了另一层职业性的身份认同, 这种身份认同经常超过了其早期形成的地方性身份认同和民族性身份认同。在堪察加西部贝斯特雷斯基区(Bystrinskii)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埃文族、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猎人中, 这种情况特别明显。

在同一个地理区域, 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关注, 即另一种“宣示”的身份认同如何形成于近年来全球环境政治的影响, 以及人们如何欣然适应之。从2000年开始,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个特别项目, 对贝斯特雷斯基区以传统方式利用自然资源的人给予了很多补贴和优惠(*traditsionnoe prirodopol’zovanie*)。和当地社区的居民坐在一起谈起如何起草这个项目的申请时, 我第一次听到新的名称——“*tradisionniki*”, 这个名称专指那些有资格获得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补贴和拨款的社区居民。自此我经常听到这个说法。那时, “*tradisionniki*”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财产, 或者某个特殊群体的身份, 不管是哪个民族的人都可以成为其成员。到2003年, 在当地本土组织的成功说服下, 俄罗斯北部及远东地区人民联盟(RAIPON)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莫斯科达成了协议。该协议规定,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专

项项目预算的资金只能分配给当地的本土民族。从那以后，究竟给哪个种族的申请人发放补贴就多由他们宣布了。

还有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堪察加的民族身份认同是如何以非常相似的方式为国家和当地的政治组织所操纵。当地有一个民族，由俄罗斯族的移民和土著的伊捷尔明人融合而成。这个具有独特身份认同的民族已经产生并存在200多年了。直至今天，他们仍然使用当地的方言作为主要的交流方式。但是根据1927年政府颁布的法令，这个具有独特身份认同的民族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法令声称，根据苏联新制定的规定，堪察加人并不符合原著民的标准，比如，他们并未以游牧为生。1991年堪察加州政府才修改了前令，迟至1995年，堪察加人终于获得俄罗斯北方少数民族的地位。然而，有些堪察加人公开表示他们愿意加入伊捷尔明族(反之亦然，伊捷尔明族也表示愿意加入其他堪察加少数民族)，他们说，公开认取其伊捷尔明族的身份会带来某些政治上的好处，因而极为重要。相反，其他民族则担心失去其独特的民族身份认同。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历史地分析问题的必要性。由此我们可以了解民族发展真实的、动态的进程，而新的“民族”可能会由此而产生。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对有些民族来说，他们的民族名称可能会就此消失，或者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中易帜。

在本文中，我向大家说明了政治利益集团如何利用苏联的、国家的、民族的身份认同来吸纳追随者，从而完成他们特殊的计划。在某些案例中，这种公开宣示的身份可能给那

些生活水平至今仍然低下的民族带来一些权利。另一方面，这种宣示的身份却可能会破坏现存的跨民族、跨地区的交往关系，而这些关系过去在各民族的发展中一直发挥着很好的作用。看来，只有未来才能告诉我们，目前这“身份重建”的进程是否为后苏联时代可行的改革途径。显然，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重建后的身份认同是否有利于人们(前提是他们强化着自我意识)与其他民族建立均衡的合作关系，即与其他民族一起应对紧迫的问题，并因此确保他们在俄罗斯北部严酷的条件下生存。

结论

上面仔细考察过俄罗斯北部居民身份管理的动态过程，我们认识到在身份认同研究方法中存在着一些方法论上的缺陷。我们应该用批判地看待目前民族志学研究中广泛运用的那种对社会关系的快照式的关注。我们应当抛弃这种快照式的研究，以习得更加宽泛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和象征性的身份认同。通过分析身份认同的象征性表现方式(比如关于物质文化和语言的例子)，以及身份认同如何因个人的目的和需求而受操纵(在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框架下)的问题，我们可以更加容易地探寻到这些现象背后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动因，并对之做出更合理的解释。

哈内克(2005)提醒我们，“民族”的身份认同并非目前我们所知的这些，换言之，人类学研究过分地强调了“民族”的身份认同。他的检点十分重要。而真正重要的问题

是：为什么长久以来（目前依然），种族划分在身份认同的讨论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以至于人类学家们都不能无视之？这个问题有几个答案。第一，人类学家无法阻止某个民族群体或民族组织利用种族划分，来实现他们的政治战略，也无法阻止说客们大打民族牌以谋私利。第二，赖于国家权威机构和本土利益集团的鼓励和支持，公开宣示的民族身份认同，诸如民族领地、新出现的俄罗斯北部本土少数民族的概念化泛种族身份认同等，已经是既成的事实，并且很可能在将来的民族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意味着“民族”身份认同最终仍然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并且应该受到足够的关注，因为这些过程需要仔细地追踪，并仔细、严格地分析。最后，民族身份认同可以使我们牢记两件事情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是人类学研究对种族划分存在的偏见，二是在目前的政治争论中，国家权威机构和本土的利益集团极频繁地利用这个概念（当然经过科学“审定”）。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强调，研究者可以决定采取怎么样的治学路线。一条路线是成为鼓吹型的人类学者，那么他势必优先选择“宣示”的民族身份认同，并且会视之为最重要的、最纯正的身份认同。另一条相反的路线是不考虑身份认同的民族维度，不管这种身份认同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第三种选择或许就是在上面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种选择给种族划分的批判性研究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也就是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允许人们更自由地选择自我认同。

参考文献

- Burch, Ernest S. Jr. 1980. Traditional Eskimo Societies in Northwest Alaska. In *Alaska Native Culture and History*, Y. Kotani and W. B. Workman (eds.), 253-304.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阿拉斯加西北部爱斯基摩人的传统社会》, 《阿拉斯加的本土文化和历史》)
- Diatchkova, Galina 2005. Models of Ethnic Adaptation to the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Russian North. In *Rebuilding Identities: Pathways to Reform in Post-Soviet Siberia*, E. Kasten (ed.), 217-235.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俄罗斯北部各民族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模式》, 《重建身份认同:后苏联时代西伯利亚的改革路径》)
- Dürr, Michael, Erich Kasten, Klavdia N. Khaloimova 2001. *Itel'men Language and Culture*. CD. (English, Russian, Itel'men). Münster / New York: Waxmann. (《伊捷尔明人的语言和文化》)
- Habeck, Joachim Otto 2005. Dimensions of Identity. In *Rebuilding Identities: Pathways to Reform in Post-Soviet Siberia*, E. Kasten (ed.), 9-26.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身份认同的维度》, 《重建身份认同:后苏联时代西伯利亚的改革路径》)
- Jordan, Peter 2003. Material Culture and Sacred Landscape.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iberian Khanty. Walnut Creek, CA /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物质文化和神圣的土地》, 《西伯利亚汉特人类学》)
- Kasten, Erich 1995.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a Kwagiulth Indian Village.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Native North America. Studies in Honor of Heinz-Jürgen Pinnow*, M. Dürr, E. Renner, W. Oleschinski (eds.), 355-67. München / Newcastle: Lincom. (《印第安村落夸吉乌尔特的社区发展》, 《美国北部土著的语言和文化》)
1998. Handling Ethnicities and/or Securing Cultural Diversities: Indigenous and Global Views on Maintain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In *Bi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 North: Ways of Preserving and Enhancing Indigenous Peoples' Languages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E. Kasten (ed.), 1-11. Münster / New York: Waxmann.(《种族划分的处理和多元文化的保证：在保护传统文化上的本土视野和全球视野》，《北部的双文化教育：保存和加强原著民语言和传统文化的方法》)

2004. Ways of Owning and Sharing Cultural Property. In Properties of Culture - Culture as Property: Pathways to Reform in Post-Soviet Siberia, E. Kasten (ed.), 9-32.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拥有文化财产和共享文化财产的途径》，《文化财产—作为财产的文化：后苏联时期西伯利亚的改革路径》)

2005. Feasting with the Seals: Koryaks und Evens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Video DVD, with German/English/Russian subtitles, red. Erich Kasten, Michael Dürr, David Koester, Tjan Zaohnaia, Berlin: Zentral- und Landesbibliothek Berlin. (《俄罗斯远东地区科里亚克人和埃文人的海豹盛宴》)

Kasten, Erich et al. (forthcoming). Koryak and Even Language and Culture. Video DVD series, with English and Russian subtitles <http://www.siberian-studies.org/publications/evenLC.html>, <http://www.siberian-studies.org/publications/koryakLC.html>(《科里亚克人和埃文人的语言和文化》)

Krupnik, Igor I. 1993. Arctic Adaptations: Native Whalers and Reindeer Herders in Northern Eurasia. 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适应北极：欧亚大陆北部的本土捕鲸人和驯鹿牧民》)

Vaté, Virginie 2005. Kilvēi: The Chukchi Spring Festival in Urban and Rural contexts. In Rebuilding Identities: Pathways to Reform in Post-Soviet Siberia, E. Kasten (ed.), 39-62.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在城市和农村语境下的楚克奇春节》，《重建身份认同：后苏联时期西伯利亚的改革路径》)